

· 华侨华人史 ·

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形成新论

任 娜 陈 衍 德

〔摘 要〕日本华侨华人群体是一种特殊的中国移民类型,历史上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形成遇到重重困难。唐朝时期,日本的华侨华人移民群体虽然已初步形成,但始终处于松散状态。宋朝时期,日本的华侨华人已经成为一个稳定的、内部具有一定社会化联系的群体,然而元朝时跌入了低谷。日本华侨华人的社会化进程至迟到明后期已经完成。17 世纪中叶中国—东南亚—日本的三角贸易关系对华人赴日产生重大影响。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全面锁国,日本的华侨华人群体呈现萎缩。隋唐时期形成的中日文化传承关系,贯穿于整个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过程,从而使赴日中国移民的文化使命显得特别醒目。

〔关键词〕日本;华侨华人;社会

〔中图分类号〕K313.2;K3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7)05-0118-09

一 前 言

目前,关于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开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特点,学界均有一定的研究^①,但将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形成放置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加以系统考察,并分析不同时段中国赴日移民的特点与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形成特征之间的关联的研究成果,却并不多。此外,对于早期的日本移民的研究多以华商为重。鉴此,本文在论及华商的同时,兼顾对其他类型移民的分析,如带有文化使命的士人移民和僧侣移民等。本文在史料文献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将揭示日本华人作为一种区别于东南亚华人和欧洲华人的一种特殊移民类型,从唐朝到清朝是如何从一个松散的移民群体发展成一个成熟的移民社会的过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日本华人移民在不同时期的构成特征、华人移民群体所显现的扩大—缩小—再扩大—再缩小的不稳定进程特点,以及 17 世纪中叶中国—东南亚—日本的三角贸易网络与华人赴日移民的关系等,本文都将进行阐述。

早期中国人移居海外,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东南亚型,其历史长,人数多,与当地土著的融合程度较高;一种是欧美型,其历史较短,人数较少,与当地人民的融合程度较低。就日本而言,既不属前者,亦不属后者,是一种特殊的中国移民类型。由于移民过程是在两个国家(地区)之间发生的,所以移出国与移入国双方之间的关系便成为影响移民进程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由于日本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它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中国的关系之曲折起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移民前往日本的历史进程,因此华人赴日暂居或定居均呈非连续性状态,人数也有大幅的起落,华人与日人的融合程度也十分复杂多变。

历史上海外各地华侨华人群体的形成,是有一定条件的。首先要求有一定数量的华人人口聚居于一一定的地区范围之内,亦即每个华人群体形成的地区是需要一定的人口基数的。其次,在人口稳定

① 山本纪纲:《长崎唐人屋敷》,东京:谦光社 1983 年版;内田直作:《日本华侨社会研究》(内田直作:《日本华侨社会の研究》),东京:同文馆 1949 年版;过放著,乔云译:《初期日本华侨社会》,《南洋资料译丛》2004 年第 4 期,第 70~80 页;钱江著,亚平、路熙佳译:《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海交史研究》2011 年第 2 期,第 1~51 页;李献璋:《长崎唐人研究》(李献璋:《长崎唐人研究》),长崎:亲和银行基金会 1991 年版;鸿山俊雄:《神户大阪的华侨——在日华侨百年史》(鸿山俊雄:《神户大阪的华侨——在日华侨百年史》),神户:华侨问题研究所 1979 年版。

增长的基础上,朝有组织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形成社会性的群体,而非无组织状态的零散组合。综观东南亚型和欧美型海外华侨华人群体的形成,都是在上述两个条件下进行的。虽然归属于这两种类型的各国各地区存在不同的具体情况,也有曲折反复的现象,但总体而言,还都是呈连续向上直线发展状态的。反观日本,情况则有较大的不同。日本华侨华人群体的形成,从长时段来看,是较不稳定的,人口基数的增长较为缓慢,且时有反复,看不出有连续向上直线发展的趋势。而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形成,也遇到重重困难。大多数情况是在某几个地方形成小规模华侨华人社会,至于全国性的华侨华人社会,是在很晚近的时候才形成的。所以在日本,从华侨华人群体向华侨华人社会过渡的进程是缓慢且曲折的。

若以中国封建王朝的兴衰更迭为时间坐标来考察中国人赴日的情况,可以发现,中国国内政权更迭前后的不稳定时期,赴日的政治难民式的中国移民便有所增加,甚至是大量增加,特别是宋元之交和明清之交这两个时期最为明显。当然,东南亚也有类似的情况,如越南的中国移民。但日本比起后者更加显著,以至可称其为特点。再者,考察中国东南沿海人民移居海外的最普遍动因,可以说经济因素是首位的,无论东南亚型抑或欧美型均如此。但就日本而言,虽然以贸易商的身份由暂居到定居也是中国人赴日居住的一种形式,但很难说是最主要的形式。至少可以说,赴日中国移民,其推动力很难说经济因素压倒一切。如明清时期许多亦盗亦商的赴日中国移民,其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大致各占一半。另外,唐、宋、明各朝代的赴日佛教僧侣,也主要是前往日本弘扬佛法这一非经济因素促成的,更不要说近代中国赴日的大批留学生(他们可视为暂居的中国移民,其中也有一些人长期滞留下来),乃是想通过日本学到西式的先进文化,与赴海外图存求财无涉。

再从中国移民的民系(血缘和地缘关系),以及所从事的职业的角度来考察,东南亚型与欧美型的中国移民多属所谓“汉族闽粤系”(其中赴欧美者多属粤系)。然而,移民日本的中国人,最早的却并非来自闽粤,而是来自闽粤以北地区。这一点当然与日本和江浙一带的海路距离较短有很大关系。由于江浙的开发比闽粤为早,因此这一带的赴日中国移民,就不像后来大批赴东南亚和欧美的闽粤移民那样属生存型移民,至少有一部分属发展型移民,即向海外寻找出路是为了寻求比在母国更有前途的发展之道。

二 唐宋时期的日本华侨华人群体

1. 侨民群体的初步形成

唐朝以前,来自中国的移民在日本并未单独形成一个群体,而是融入了当地土著,被称为“渡来人”或“归化人”^①。从文化上来说,这类中国移民在融入的过程中已渐渐丧失了自身的民族特性。因此这一类中国移民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严格地说只能从唐代开始来讨论华侨华人群体在日本的形成问题。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此一时期,日本国家统一局面已逐渐形成,社会趋于安定,成为吸引外来移民的一个重要因素。唐朝包括僧侣在内的各种中国移民前往日本渐多,其中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并建立了唐招提寺,弘扬汉传佛教,是中日交往史上的一件大事(鉴真及随行人员 753 年第六次东渡日本成功)。与此同时,日本也派出大量遣唐使和留学生(包括留学僧)来到唐朝。当这些遣唐使和留学生回国后,跟随他们返回日本的,还有许多受其招聘的中国人才(鉴真就是日本留学僧和遣唐使力促其赴日的),以及唐朝官方派出而因种种原因滞留于日本的人员。罗晃潮指出:“这些人便都成为当时的华侨,不少人还入了日籍成为日本华人,仅见于日本史籍的便有数十人,其中最著者有沈维岳、袁晋卿、张道光、卢如津、李元环、陈怀玉、徐公卿、皇甫东朝、皇甫升女、晏子钦、朱玖、孟惠芝、吾税儿、王维倩、王希逸、李法琬、斯麻吕等等。他们中不少人还获得日本朝廷赐给的日本姓氏,并叙位任官。这些人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②

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回国后,正是在赴日的中国人的帮助下,完成了日本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改

^{①②} 罗晃潮:《日本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5~36、44 页。

革——大化革新。韩国磐指出：“[日本]当时所颁行的班田制、租庸调，和文武天皇时在公元701年（大宝元年，唐武后长安元年）所颁布的《大宝律令》，都受到唐朝直接而巨大的影响。”“日本的官制，从大化革新后也形成了由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系统”，其原型也来自唐朝。文武天皇时建造的平安京（京都）也是模仿唐长安城建成的。其他如仿汉人草书制定平假名、取汉字偏旁制定片假名，从而有了日本自己的文字，等等，都与日本访唐人员及随其赴日的中国人密切相关^①。

中国唐朝时期，日本认识到自身的落后，自觉自愿地向中国学习，从而使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方向与中国日益接近、渐趋一致。中国移民前往日本，与此一形势可谓是互为因果。换言之，中国移民带来了先进文化，使日本社会与中国社会的差别缩小了，而日本社会和文化的这种变化，鼓励了更多的中国移民前往日本，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虽然从移民人数和规模来看，这一时期尚无法与明清以后东南沿海的大批移民相比，但后者是一种以普通百姓为主的移民，与前者的精英式移民亦无法相提并论。因此可以说，唐朝时期中国的人才精英移居日本，是无法简单地以人数来加以评判的，而必须将其置于当时中日两国关系的大框架下，以及当时东亚独特的历史大背景下来考察。

当然，也不能忽略因贸易关系而移居日本的中国移民。贸易活动对移民的推动在唐朝虽不十分显著，但毕竟是此间中国人前往日本暂居甚至长期居留的重要“推力”。有日本学者据来华的日人记叙进行统计，唐朝船只前往日本的有二十余次，所列唐朝商人名字有李延孝、李处人、张友信、李邻德等多人，其中有多次前往者。而自日本返唐的有十余次。商船往返次数加起来有四十多次，超过遣唐使次数。这还是仅就唐亡之前五六十年而言^②。值得注意的是，前往日本的次数超过返回中国的次数，这其中就存在着中国商人滞留日本不归的可能性。再者，由于当时日本的造船技术远不如中国，因此许多建造船只的中国能工巧匠便前往日本并长期居留下来，为日本建造海船。据《续日本纪》记载，日本养老七年（722年）“唐人王六仲始造飞舟进之，天皇嘉叹，授从五品下”。又，唐会昌二年（842年）在日本佐贺岛由中国人承造樟木船1艘。同年，唐朝商人张友信在日本肥前松浦郡柏岛建造大船，当然也使用了不少中国工匠^③。这些中国造船工匠，构成了当时侨居日本的中国人之一部分。

综合地看，唐朝时期中国在日本的移民群体已初步形成，但始终处于松散状态。中国移民中的各个阶层之间并未产生太多的联系。僧侣阶层主要活动于日本佛教界，以弘扬汉传佛教为己任，尽管其中的高级僧侣或与日本政界有所关涉，其所倡建的中国式佛寺也推进了日本建筑技术的发展。文人知识阶层除了与日本文化界关系密切外，也与当时日本的政治改革有所互动，并通过他们与日本遣唐使，以及与归国的日本赴唐留学生之关系，对日本政治产生某种影响。商人阶层对中日贸易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雇用中国工匠到日本从事某些手工业（主要是造船业），因而商人与工匠的关系密切，但仅靠这两个阶层无法形成真正的华侨华人社会。总之，由于唐代的移民各阶层分别与其对应的日本社会阶层产生联系，中国移民内部并无整合的需求，因此虽然从总体上看，在日本已开始形成华侨华人移民群体，但仍处于初级阶段，只是一种结构松散的侨民群体。

2. 华侨华人社会萌芽的出现

宋朝与日本的关系与之前的唐朝相比有些许变化，官方色彩减弱而民间色彩加重，此间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虽然不像唐代那样明显，但已经从制度层面向生活层面扩展，由此可折射出中国移民在日本的重要性。因为生活层面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需要两个民族普通成员的长期接触。北宋初年中日海路以中国浙江与日本九州之间的通航最为频繁，这就为日后众多中国僧人自浙江赴日埋下了伏笔。由于此间像遣唐使那样的官方使节并不多见，因此日本僧人多附船往来于中日之间，由此可见两国海上贸易较前有所发展。这些情况都为中国人迁徙日本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得宋朝的赴日中国人比唐朝增多了。

就中日双方情况而言，北宋大致相当于日本藤原氏全盛前后，南宋则相当于日本武家兴盛时期。

①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4～246页。

② 罗晃潮：《日本华侨史》，第47页。

③ 转引自郑学檬等：《中国经济通史》第4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69～670页。

在这三百一十余年中,中国方面,北宋的疆域较为广大,局势相对平稳;南宋则偏安江南(包括四川及陕西一部),且时有战事干扰。日本方面,滕原氏在对外关系中持保守态度,武家时期则较为开放。这样一种不同和变化,自然影响了中日之间的贸易和人员往来,从而使中国移民群体在日本的状况也有所不同。从贸易的总体状况来看,“在北宋时代,日本对外贸易颇有衰退倾向,采取禁止本国私人私自到海外去等锁国主义,因此来往商船只有宋船”,并且中国船只开往日本分外频繁,几乎年年不绝,“但开往宋朝的日本船却几乎不见”^①。进入南宋以后,日本武家采取的进取政策,鼓励了对外贸易,所以日本船只开往宋朝的也不少。南宋王朝更加倚重外贸收入,故对外通商更加频繁。

北宋时期赴日的中国商人见之于中日史籍者不下三四十人。他们中有的与日本公卿贵族多有交往,有的从离中国较近的海港深入日本列岛更远之处,有的长期居住懂得日语,有的获准成为日籍华人并娶日本女子为妻。总之,他们更加适应日本社会并能长期在彼处生活。南宋时除了商人继续成为赴日华侨华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旅日中国工匠也比以往更多,“由于谋生的需要,他们分布地域较广,除博多外,在九州大分县的深山及远至关西的京都、奈良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中有许多人为日本寺庙建筑贡献了聪明才智,建造了不少精美的石塔、石像,雕刻、铸造了许多佛像和其他艺术品,有的还在造船、雕版印刷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由于专心致志从事这些工作需要他们较长时间居留日本,所以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旅日华侨^②。

宋朝士人赴日者虽然在数量上无法与商人、工匠相比,但他们在思想文化上的贡献绝不比后者逊色。罗晃潮写道:“侨日士人中最著者有李用、朗元房等人。前者实为华侨在日本专事传扬宋代理学的第一人。”“宋医朗元房被北条时和北条时宗聘为侍医,在镰仓侨居三十余年,对日本医学的发展贡献不小。”^③而作为中国移民之一部分的宋朝僧人,与唐朝僧人一样,对日本古代精神文化做出了贡献。如兰溪道隆率其弟子义翁绍仁等人前往日本,并开设镰仓时期首个禅宗道场(1246—1249年间之事)。此后宋朝僧人不断赴日,日本禅宗由此而兴。

从宋代中国移民的结构来看,仍然主要由僧人、士人、商人、工匠等组成,但人数较唐代有所增加,居留时间也延长了。以商人为例,“较早时,唐人随船乘季风而来,做完买卖后又乘季风而回。后来由于业务上的需要,不得不留驻下来,娶妻置宅,生儿育女,是为早期出现的华社”^④。从史料记载来看,赴日华侨所娶多为日本女子,可见多为单身男性。但娶日籍妻子者毕竟为少数,华侨华人群体的维持还须靠不断补充新鲜血液,这就有赖于中日海上交通的发展。宋代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均比唐代有更大进步,这使在日华侨华人群体能维持在一定的人数水平上。再者,由于中日海商的种种私人关系网络,甚至中日佛教僧侣(主要是禅宗)的关系网络,也使得日本需要的各式各样人才东渡日本并居留下来,从而达到在日华侨华人形成群体的人口基数要求^⑤。

宋朝时期在日本的华侨华人群体是否已经完成了内部整合,从而开始形成一个中国华侨华人社会?从种种条件来看,这样一个社会至少已经露出萌芽。换言之,此间日本的华侨华人群体已经成为一个稳定的、内部具有一定社会化联系的人群。罗晃潮指出:“到平氏政权的全盛时期,即12世纪70年代,来日本定居于博多的宋人达到了高峰。据日本《石清水文书》记载,当时在博多的筥崎宫附近有一条唐人街,居住着很多宋人。他们按照祖国的风俗习惯,在街中兴建了许多中国式祠堂,被称为‘宋人百堂’。”1195年,归国的日本留学宋朝的荣西禅师还在博多创建了一所寺庙,有可能成为侨日宋人的参拜处所。如果由此上溯至8世纪,日本执政者在福冈(博多)设置了大宰府,亦即处理一切对外事务的机构,来自中国的官方使节和民间商人首先在这里受到入境接待,尤其从12世纪初开始,“来到日本的宋朝商人、工匠大都聚居于博多,并以北九州为中心,活跃于九州地区的福冈、长崎、大分、熊本等县,甚至远达越前、镰仓”^⑥,那么,就可以看出,此间博多及其周边乃至更远地区的华侨华人社会化

① 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7、243~244页。

②③⑥ 罗晃潮:《日本华侨史》,第64、78~79、79、65页。

④ 潘翎主编,崔贵强编译:《海外华人百科全书》,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333页。

⑤ 相关研究如,森树建一著,曹建南译:《濂户美浓窑对福建陶瓷的模仿和中日禅僧》,《海交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65~74页。

群体的形成,就不是偶然的,而是长期发展的结果。

元朝时期,中日双方均受各自内部问题的困扰。尽管中日社会经济的发展互有需求,贸易和人员往来在大部分时间里仍或明或暗地进行,元代的侨日僧侣,雕版、铸造工匠,以及商人,也对日本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做出了贡献^①,但这一时期,中国人能畅顺地移居日本已非易事,除非日本方面有特殊需要,或者中国方面有特殊的“推力”。这里关键的因素是统治中国的元政权已非往昔在日本人眼中辉煌的唐宋帝国可比,而日本自身也已完成“唐化”,进入内部调整时代。总之,元朝时期的日本华侨华人群体在整个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处于一种低谷的状态。

三 明清时期的日本华侨华人社会

1. 日本华侨华人社会正式形成

明朝时期,尤其是明中叶以后,中国向海外移民出现了关键性转折。从世界大局来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开始形成。从中国内部来看,封建经济内部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安土重迁的农民意识已开始松动,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百姓,已经看到到海外寻找生存空间无论风险多么巨大都是一条可尝试的出路,加上私人海商资本也已开始突破封建壁垒的重重围堵,这几股变革力量汇合成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推进了移民潮向海外的涌动。作为近代世界三大移民潮之一的中国海外移民(另二者是欧洲人移民美洲新大陆和非洲黑奴贩卖),正是在此一形势下发展起来的。

从元末明初到明后期倭患消除以前,明朝与日本的贸易关系一直处于或明或暗、不绝如缕的状态中^②。中国人移居日本的进程也从未间断。从日本方面来说,其对中国商品的需求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大抵日本所需,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按:即杭州)造也。他如饶之磁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③从中国方面来说,海上私商对日贸易获利甚巨,“以数十金之货,得数百金而归;以百余金之船,卖千金而返”。特别是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至明中叶已多以银为流通货币,对日本银子需求甚殷。有商船在日卖货得银之后,“所得倭银,在船熔化,有炉冶焉,有风箱器具焉”;“所得倭银,即令银匠在船倾销。计各商觅利,多至数倍,得意汛舟而归”^④。双方彼此的强烈需求,反映出两国间商贸往来的发展势不可挡。

从倭寇完全平定的 1566 年,至清朝收复台湾的 1683 年,这一百多年时间,可谓中国东南私人海上贸易的黄金时代。平倭之后的明朝已经日趋没落,无力控制海外贸易了。以福建漳州月港开港(1567 年)为标志,东南沿海私商日益活跃,最终成为中国海上贸易的主角。这当中,中日贸易以及由此而来的商业移民,构成此一历史的重要部分。明中叶至明末清初,以闽南人为主体的闽商一直是中日之间的主要贸易商,他们在日本九州的侨居亦成必然之势。1540—1635 年间,他们可以不受限制地居住在九州岛上的任何港埠,可以同当地日本商民自由互市。然而从 1635 年起,幕府下令所有外国商船只能在长崎从事交易,从这一年起,所有中国商人(九州岛上的以及日本其他地方的)都被限制居住在长崎。钱江认为,在此之前的近百年内,“九州岛上涌现出至少 7 个中国商人的侨居社区,特别在丰后、肥前的平户以及萨摩(今鹿儿岛县西部)等地。在九州岛寓居的这些中国商人主要来自闽南、徽州以及浙江沿海地区”。其中,最早的华人社区可能是博多。钱江引用明朝文献《日本考》的记叙,说博多“有一街名大唐街,而有唐人留恋于彼,生男育女者有之,昔虽唐人,今为倭也”。此外,在平户和五岛列岛也可找到闽商在当时活动的踪迹。钱江引用郑舜功(明朝派出的非正式使者)之说,“据当地传说,平户岛上的中国侨民最初出现于 1535 年前后,而且是来自福建的一批民间私人海商”。而著名的海盗头目、徽州人王直(他的手下大多为闽人),也在平户建立了一个“唐人町”。1540—1550 年

① 罗晃潮:《日本华侨史》,第 80~84 页。

② 岩生成一:《有关近代中日贸易的计量考察》(岩生成一:《近世日支贸易に關する数量的考察》),《史学杂志》1953 年第 62 编第 11 号,第 62~71 页。

③ 姚士麟:《见只编》卷上,谢国桢编:《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47 页。

④ 王在晋:《越镌》卷二一,谢国桢编:《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第 138 页。

间平户一跃而为九州岛的第一贸易大港,五岛列岛则是王直集团的走私贸易基地。钱江指出:“日本平户湾西北海岸的福建商人侨居社区在17世纪初最为繁荣兴盛,尤其是在李旦任侨领时期,闽商在当地的的活动达到鼎盛,而李旦本人则是泉州籍闽商的杰出代表。”他还指出:“在17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间,长崎和平户两地的闽商侨居社区关系密切,来往频繁。当时,富有的福建商人一般在长崎和平户两地都置有府邸房产和存放货物的仓库。”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此间日本的华商社区已经由地缘和血缘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了^①。

1635年是日本华侨史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一年,幕府发布了对华侨的居住限制令,还首次在长崎任命侨领为“唐年行司”,以掌管包括诉讼在内的华人社区事务。日本学者荒木周道在《幕府时代的长崎》中列举了担任过这一职务的一系列侨领姓名:欧阳云台、何三官、江七官、张三官、何八官、陈奕山等^②。其职应与东南亚华侨社区的早期首领“甲必丹”相类似。中国学者李金明的明代海外贸易史研究,除引述此一日本论著外,也引用了明朝的相关史料,以说明日本的华侨华人群体状况。他说:“据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亲身到过日本的刘凤岐说,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侨居长崎的明商还不到20人,‘而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合(日本)诸岛计之,约二二万人’。又据天启五年(1625年)福建巡抚南居益说,‘闻闽越三吴之人,住于倭岛者,不知几千百家,与倭婚媾长子孙,名曰唐市’。这些与日本人通婚生子的华人假设有5000家,每家以5口人计算,总数也达25000人。”^③由于缺乏元朝在日华侨人数与之相比较,故难以判断其人数的扩张规模。但就当时中日贸易的繁盛来看,商人移民的人数肯定是增加了。而且从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日本华侨华人群体的社会化进程,至迟到明后期已经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华侨华人社会在日本可以说已经正式形成了。

明后期除了丰臣秀吉两次侵朝战争期间中国商人赴日减少甚至停止之外,赴日商船一直呈上升趋势。日本学者岩生成一根据欧洲各国的记载(特别是荷兰商馆文书),将日本庆长年间以后至正保元年(1644年)渡航日本的中国船只情况整理出来,发现每年约有三十艘,多时有六七十艘。宽永十二年(1635年)中国商船被限定停靠长崎一港之前,除长崎外,萨摩、平户、唐津、博多等九州各港,甚至本州的大阪、纪州(今和歌山)附近均有中国商船渡航的记载,而其船数在宽永十八年(1641年)达到97艘。可见在中国国内政局动荡的局面下,中日贸易不减反增^④。而此间的赴日中国商人更是以闽人为主。早在万历四十年(1612年)兵部就报告说:“……通倭之人皆闽人也,合福、兴、泉、漳共数万计,无论不能禁。”^⑤当郑成功集团完全控制了台湾海峡及其南北两向的海上贸易通道后,闽人更是在海外贸易上独占鳌头。因此,此间移居日本的中国人当亦以闽人为主。刘序枫认为:“唐人町之分布,以九州各地为最多,本州亦有一些。以九州为例,臼杵、府内(在今大分)、日向、萨摩、大隅、肥后、博多、丰前小仓、平户、五岛、岛原各地均有唐人或唐人町之记录。”^⑥

那么,此间日本的华侨华人之成分如何呢?由他们所组成的华侨华人社会情况又如何呢?刘序枫研究后指出:“这些居留者中有富商,也有儒士、医生、技术者。此外,亦有不少被倭寇、海盗所虏而转卖至日本者及其他亡命无赖之徒。”^⑦在各式各样的移民海外的华人当中,商人在华侨华人社会中的作用是最大的。因为海外华人社会没有士绅阶级,商人就取而代之地发挥了领导者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日本的华人社会与东南亚的华人社会并无不同。尽管有作为政治流亡者的儒士,但他们已失去曾经在本土拥有的社会基础,不可能像在本土那样发挥作用。商人除了作为日本政府与华人之间的桥梁,统领华人社会之外,还“与国内亲友保持联系,利用宗族、同乡及地缘等关系经营中日间的贸易”,有的还成为所谓“倭牙”,即经纪人,居间介绍华商与日商的交易^⑧。而那些被掠卖到日本的劳动

① 钱江:《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

② 荒木周道、福田忠昭增补订正,长崎市役所编:《幕府时代的长崎》(荒木周道、福田忠昭增补订正、长崎市役所编:《幕府時代の长崎》),京都:临川书店1973年版。

③ 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3页。

④ 岩生成一:《有关近代中日贸易的计量考察》。

⑤⑥⑦⑧ 刘序枫:《明末清初的中日贸易与日本华侨社会》,(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1999年第11卷第3期,第442、448、446、447页。

者,与鸦片战争之后被掠卖到东南亚和美洲的华工,其身份地位则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更早而已。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的特殊国情,使日本的华人在传统的延续方面受到种种限制,被迫无奈地融入了日本人社会,从而使华人社会在规模上无法扩大,在文化上逐渐失去了自己的“根”。最明显的就是华人如欲在日本长期生存,就不得不改为日本人的名字。例如郑成功的母亲其实是第三代华人,但从其名字上看似乎与日本人无异。再者,大多数华人单身男性也不得不娶日本女子为妻,从而使日本妻子抚养成人的后代更快地丧失中华文化的特性。

2. 中国—东南亚—日本贸易网络与中国移民

这一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包括台湾)—东南亚—日本的三角贸易关系与中国移民有着密切关联。遍布东南亚各地的华商通过与日本商人的贸易,发挥着中日间接性贸易的作用。在这一关系当中,台湾扮演了重要角色。台湾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是往返日本和东南亚之间的中国商船的必由海路,而且无论在荷据时期还是郑氏占台时期,台湾自身即为贸易基地。从17世纪30年代初开始,“郑芝龙的亲、堂兄弟,叔、伯、甥、侄,甚至他的母亲,都在合力经营海外贸易,郑氏家族的海舶遍及中国沿岸、东南亚与日本诸港口。郑芝龙违朝廷之禁,开辟了与日本的直接贸易航线”^①。台湾—琉球—日本的中国移民路径,由于岛链和贸易链的双重连接而变得更加重要。

根据葡萄牙学者的研究,1620—1640年间澳门对日本长崎港口的贸易船只数目为80艘^②。澳门的货源有一大部分来自中国内地,因此这也可视为中日贸易的一部分。而中国人通过澳门前往日本,也不是不可能的。同一时期,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商人为了避免违禁直接前往日本,而来到马尼拉与日商进行交易,“徐光启的《海防迂说》中提及,嘉靖年间私贩日本虽减少,但海禁解除后,江浙、福建商人将湖丝等商品转卖西洋、吕宋诸国,在当地与西班牙、日本商人进行交易”,“吕宋成为中日贸易的中继地,日本‘朱印船’贸易商多以银换取中国生丝和当地土产”^③。吕宋即为马尼拉岛屿,其中的马尼拉市是华商聚居的重要海港,因此不排除华人经此地前往日本的可能性。

从更加广阔的视角来考察此间的中日贸易,可以说17世纪中叶中国—东南亚—日本的三角贸易关系已经深深嵌入东亚的海洋贸易网络之中^④。“中国在日本的贸易获得巨大发展。1664年,有33艘中国船只抵达日本,其中4艘来自柬埔寨,4艘从台湾来,5艘由广南发舶,1艘由琉球启锚。”当时越南北部的东京(河内)成为另一个中日两国商人贸易的据点。“1677年,从厦门、广州和日本来的3艘装载大批货物的船只抵达东京”,“日本对东京丝绸的需求量极大,使丝绸贸易成为两国交往的基础”。所谓东京丝绸,只能是来自中国的丝绸,因为中日之间不便进行直接交易,因而在东京(湾)间接地进行交易。再者,金边也成为中日贸易的又一个据点:“1665年,有4艘中国船溯流驶往金边,其中3艘来自日本,1艘由澎湖列岛而来。”^⑤总之,面对清朝的海禁和日本的锁国,中国商人还是能以迂迴曲折的方式进行中日之间的贸易。而在这张巨大的贸易网络之下,有可能隐藏着另一张网络,那就是商业移民和其他人员的国际迁移网络。由此推断,中国人移居日本并非单纯地从中国本土迁出,经由第三地迁入日本既有可能性,也有现实性。

3. 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萎缩

正当东亚海域的国际贸易日益发展、移民渠道日益多元化之时,日本国内开始出现一股与之相违背的逆流,那就是锁国令的逐步推行。从德川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开始,各项闭关自守的政策和

① 包乐史著,庄国土、程绍刚译:《中荷交往史(1601—1989)》,莱顿:路口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

② 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著,何吉贤译:《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政治和经济史》,澳门: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1997年版,第220页。

③ 刘序枫:《明末清初的中日贸易与日本华侨社会》,第442页。

④ 松浦章:《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松浦章:《清代海外贸易史の研究》),京都:朋友书店2002年版;奈良修一:“17世纪中国对日本的生丝出口”(奈良修一:“一七世纪中国における生丝と日本への輸出”),《和田德教授古稀纪念论文集——明清时期的法制和社会》(《和田德教授古稀纪念明清時代の法と社会》),东京:汲古书院1993年版,第469~490页。

⑤ 玛利—西比尔·德·维也纳著,杨保筠译:《17世纪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中外关系史译丛》1986年第3辑,第224~225页。

措施不断推出,包括禁绝基督教、禁止日本人出国、限制对外贸易等等。其中,针对侨居日本的华侨华人及赴日贸易的中国商人的有:日本各地华侨华人必须迁往长崎集中居住;赴日贸易的中国商船只能停靠在长崎一个港口,且中国商人和船员在交易完成之后必须离开,不得滞留;幕府特许的日商按官方垄断价格收购进口的生丝等中国商品,以抑制其高昂的价格;限制银、铜等日本产品流向中国的数量,等等。与此同时,日本的锁国还包括对内政策,其中对中国商人影响最大的有禁止日本武士经商,从而断绝了中国商人的内应,使其无法与日本的合作者共同赚取利润。这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策和措施虽无法根本扭转中日贸易,以及中国人移居日本的大趋势,但其对中国商人的不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清朝前期中日贸易继续发展,但到后期即呈下降趋势。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将1662—1839年间中国商船往来日本的数目进行了列表统计,在这178年当中,赴日中国商船的高峰出现在1684年以后的30年间,其中1687年达到137艘的峰值。而自1714年开始明显下降,自1817年开始再也没有超过每年10艘^①。其中原因虽然较为复杂,但此间中日两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双方贸易的商品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对日需求最大的银,由于国内银矿的开发而得到缓解;而日本对华需求最大的生丝,也因其国内生丝产量的增加而大为减少。另一方面,中日两国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上层富裕阶级),对对方有了新的商品需求。中方对高级水产品(如海参、鲍鱼等)的需求增长最快,而日方对高级中药材(如人参、大黄等)的需求量最大。再者,虽然中方对铜仍有需求,但由于日方对铜出口的限制,以及中方为官府采办进口铜的商人在国内也遇到种种麻烦,因而铜的贸易趋于下降,而以往由日输华的黄金,因此间日本的金银比价远高于中国,促使中国商人反而向日本输出黄金以赚取巨额差价^②。

中日贸易关系的变化对日本的华侨华人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此间日本对华贸易实行“勘合”制度,向中国商人颁发“信牌”,持有信牌方许贸易。日本文献《和汉寄文》对信牌的作用解释道:“今合行给照,即与信牌一张,以为凭据,进港之日,验明牌票,缴讫即收船只。其无凭者,即刻遣回。”^③这就结束了以往自由销售的贸易方式,中国商人必须获得日方批准查验方可进行交易。此外,日本政府还相继对贸易额与每年赴日贸易的中国商船数量实行了限制。其次,日本对赴日中国商人实行了严格的居住限制,原先中国商人可以任意投宿在其亲友家中,然而1688年幕府在长崎建造了唐人坊,次年令中国商船登岸人员均须住于唐人坊围墙内,禁止擅自外出;“除规定派驻人员外,不准其他人员擅自进入围内”^④。如此则赴日中国商人与当地华人社会的联系也受到限制,即使是中国商人外出参拜寺庙,日方也要派人跟随。另一方面,幕府任命“长崎奉行”这一职官“统治该地,一面管理对外贸易,并不断监视外国的动静,防备外寇”^⑤。其职之下还有名目繁多的大小职官,分工明确地管理来日贸易的商船、商品与商人的各项事务。此外还设有地方官会同处理对外贸易事务的“长崎会所”。在锁国的大背景下,日本政府对华侨华人社会进行严格的控制,移民出入从而受到极大限制。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日本华侨华人群体失去新鲜血液的补充,处于萎缩状态。不仅如此,原有的华侨华人本身也处于蜕变之中。那些被称为“住宅唐人”的华人,实际上已经被日本社会逐渐同化,一部分人还被幕府任命为“唐通事”(相当于翻译官)^⑥。而作为华侨华人社会组织的长崎四唐庙,也因不再有来自中国的僧人而空缺了住持。1723年最后一位中国僧人赴日之后,长达一千年的中国僧人东渡日本的历史就此终结了。虽然日本社会仍不时需要中国人才,而为数不多的身怀特技的华人也获得幕府的特许在日本长期居留,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华侨华人社会日益萎缩的状态。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

①④⑤ 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39~647、661~663、634页。

② 范金民:《赋税甲天下:明清江南社会经济探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97~419页。

③ 《和汉寄文》,大庭修编:《享保时代的日中关系资料一:近世日中交涉史料集二》(大庭修编:《享保时代的日中关系资料一:近世日中交涉史料集二》),京都:同朋舍1986年版,第111页。

⑥ 林陆朗:《长崎唐通事——大通事林道荣和他的周边人物》(增补版)(林陆朗:《长崎唐通事——大通事林道荣とその周辺》),长崎:文献社2010年版。

赴日的中国商人仍然担当着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他们是中国特殊人才输入日本的中介桥梁,是中国文化精品进入日本的传递者,客观上使中华文化继续传播,也对近代以后华侨华人社会在日本以新的面貌重新出现作了历史文化的铺垫。

四 结 论

纵观唐宋元明清中国的赴日移民,其中人数不多的精英移民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当然,以具备特殊技能者为代表的技术移民之作用亦不可忽略。从贸易商人演化成移民的情况,虽然与各国相比并非十分特别,但其或明或暗的表现,使其所扮演的角色蒙上了一层特殊色彩。所有这些,或许皆可视为日本华侨华人群体的特点。再者,历代赴日的中国移民不断重演着群体扩大—缩小—再扩大—再缩小的不稳定进程,亦即中国移民不断被日本社会所同化,这就意味着,在新移民不足以弥补融入日本社会的华人之情况下,在日华侨华人群体的规模将受到限制,甚至处于萎缩状态。而江户时期长时段的锁国政策,终于使封建时期的日本华侨华人社会进一步萎缩。

尽管历史上中日关系起伏跌宕,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在多个时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也始终无法直线上地扩展其规模,但由隋唐时期形成的中日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日本向中国学习先进的文化),却基本不变地贯穿于整个日本封建时期。这就使赴日中国移民的文化使命特别醒目。这一使命通过中日之间大量而频繁的物资、人员、信息交流得到了实现。

收稿日期 2016-06-23

作者任娜,历史学博士,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讲师,广东,广州,510632;陈衍德,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福建,厦门,361005。

Revisiting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Immigrant Society in Japan

Ren Na and Chen Yande

Abstract: As a different type from that in Southeast Asia and Europe, the Chinese immigrant community in Japan suffered more during its history of forma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a loose Chinese immigrant community in Japan had come into being. Until the Song dynasty the community had evolved into a stable community with inner social links. However, its development reached its lowest point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By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process of socialization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Japan was completed. The triangular business network betwee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Japan during the mid-17th century had a great impact on Chinese immigration to Japan. In the period of the Tokugawa Shogunate Chinese immigrant society shrank. The inherited cul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since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was continuous with the whole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 society developments. It stands out that Chinese immigrants to Japan was more influential on wider Japanese culture.

Keywords: Japan; Chinese immigrant; society

【责任编辑 周祥森】